

诺贝尔文学奖推迟至13日揭晓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昨天,人们都在准备迎接10月6日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但是传出消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延期揭晓了。要推迟到10月13日公布。

诺贝尔文学奖向来是在每年10月第一周的周四揭晓。按这个算法今年应该是在10月6日揭晓,但是直至北京时间10月6日傍晚,青年报记者

看到诺贝尔奖官网上有关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时间依然是“The date will be set later”(时间将稍后公布)。瑞典学院院士佩尔·韦斯特伯格透露,诺贝尔文学奖将在10月13日公布。

这引发了很多猜测,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入围作家太势均力敌,评委们争执太大,难以抉择了?毕竟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一般是遇到争议性比较大的作家,需要反复投票才会产生的。但是韦斯特伯格告诉记者,改

期和“算法”及月历有关。

按照流程,每年2月至5月,瑞典学院18名院士中的5名评委先从全球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二十来人,把名单交给18名院士,“提名”由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各国文学评论家等提供名单;5月底,这5名院士再遴选出5个决选名额;6月,18名院士阅读这5位决选作家的作品;9月,院士们回到斯德哥尔摩用数周时间开会讨论,最后全体投票决出最终获胜者。

■文化动态

莫言： 香港畅谈文学与乡土

5日下午,香港浸会大学曾陈式如会堂,可容纳4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而门外还有上百位进不了场的学生正排成一字长龙等待进入另一个直播间——适逢香港浸会大学60周年校庆,校方邀请作家莫言来校进行主题为“文学与乡土”的讲座,于是,出现了如此盛况场面。

会堂里,主讲台的背景是一幅云雾中的乡村画面,上书:“文学与乡土”,这正是莫言本次演讲的主题。

“《生死疲劳》 应该算是我遗憾最少的作品”

莫言首先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并谈及作品《生死疲劳》的创作风格。正是这部作品,在2008年摘得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创办的第二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的桂冠。

“如果让我选一部最好的作品,我可能选不出来,但是让我选一部遗憾最少的作品,我要选《生死疲劳》。”莫言表示,这部作品叙述了从1950年到2000年这50年间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过程,书中围绕土地这一沉重话题,采用动物的独特视角,借助佛家的六道轮回,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也反映出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80年代突然接触到 门外的风景“脑洞大开”

在谈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马尔克斯时,莫言谈到,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作家都受到来自拉丁美洲作家的影响。“那时候,我们从刚被解放的状态下突然接触到了门外的风景,由习以为常地阅读现实主义,突然跳到西方现代派的魔幻作品,这些作品激活了我所有的记忆,让我‘脑洞大开’,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他指出,一个作家会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一个民族的作家又受到另外一个民族作家的影响。通过阅读不同作家的作品,会激活创作灵感,唤起情感的强烈共鸣。

向鲁迅的 “乡土文学”致敬

2003年11月,中国电影《暖》荣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而这部电影正是由莫言创作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小说以倒叙手法,描写了一个离乡十年的读书人井河回乡与昔日恋人暖重逢的故事,刻画了主人公井河对暖的矛盾复杂心理。

莫言谈到,现如今农村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但是人们所恪守的道德和观念依然是鲁迅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白狗秋千架》正是向鲁迅那个年代的“乡土文学”致敬,尽管两代人的经历大不相同,但是遇到的矛盾却是类似的。他说,人生都会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会面临两难甚至多难的选择,而这正是生活的意义。他强调,鲁迅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鲁迅作为一个话题,是永远绕不过去的。”

据新华社电

“发掘名人”请谨而慎行

□郦亮

最近有三本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本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一本是张爱玲的《爱憎表》,一本是胡兰成的《易经与老子》。这三本书之所以被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所谓“发掘名人”文化遗产的“最新成果”。但是如此轻率发表成果,是否靠谱呢?是否应该更加严肃呢?这都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发掘名人”很盛行

发掘名人,顾名思义就是找到名人不为人所了解、被历史湮没的所谓文化遗产。国学大师钱穆的这部《中国文学史》不是钱穆写的成书,而是钱穆1950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课时的内容。由他的弟子记录,很多年之后又进行誊写、校订、整理而成。所以,可以说是一部讲义。今年6月由出版社首次推出。很多人都争相赞美,称之为“一部贵族的文学史”。

张爱玲的《爱憎表》发表是几天前的事。《爱憎表》是张爱玲回忆少时的长篇散文,《爱憎表》写于1990年,全文两万三千余字,但最终并未完成。据称2015年夏天,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交给研究张爱玲小说的香港学者冯晞乾这叠“以往事为主,零碎、潦草、次序未明,也不知道页数”的手稿,冯“从中区分出二十六页纸,再排列次序,重构出部分的《爱憎表》”。

巧的是,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也在差不多时间被“发掘”了。几天前传来消息,胡兰成晚年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著作”《易经与老子》经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胡兰成的一部讲义。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所讲的《易经》和《老子》。“胡兰成举史上的天意人事,以自己的切身经历,结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中日国际形势等现实事件来谈论,颇多独到观点。”

这些本来已经被历史湮没的所谓文化遗产,经过今人的发掘,再加

以包装,讲了很多“故事”(比如说胡兰成的听众里包括很多日本名流,其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日本首相等),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震撼,让人感觉真的是金子重现人间,而之前多年隐没于世是多么的令人遗憾。不读这些发掘出来的最新成果,是称不上一个文化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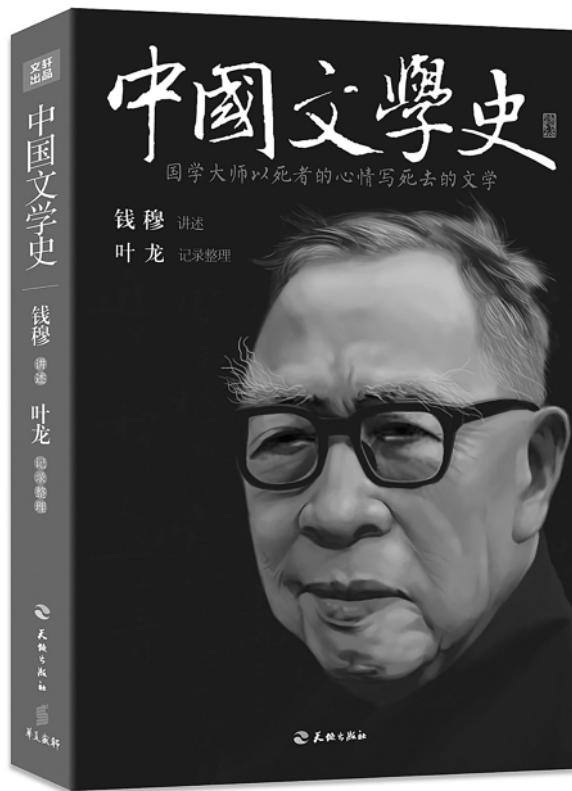
推举只是为了销量?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出来后已经有学者进行了反思。其中有人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学史》是钱穆“大师的新装”。他们认为《中国文学史》存在“细节考证不深入,人云亦云”、“美学观念陈旧、迂腐,不具备写文学史的能力”、“对西方文学缺乏基础的了解,却好妄言”、“自造规律,主动入魅”等问题。就连给予赞誉的专家也认为,《中国文学史》并非专业的文学史著作,是给外行人读的文学史,是课堂实录。

《爱憎表》当然争议更大了。张爱玲根本都写不下去了,丢在纸堆里,直到去世都没有管它。后人从“零碎、潦草、次序未明,也不知道页数”的手稿里重构出来的《爱憎表》,其可读性自然可想而知了。近几年,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和一些出版商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将张爱玲觉得无法拿出来见人,囑意要销毁的手稿,整理出来,出成书进行销售。张爱玲一贯对自己的文字十分爱惜,写文章也十分讲究的,现在如此被人拿出来“献丑”,不知道张爱玲天上知会怎么想。

胡兰成《易经与老子》因为刚刚出版,业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严肃的评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胡兰成讲古代经典的最好的作品。他认为最好的东西,早在生前都已经出版了。

在这场“发掘名人”的风潮之中,确实有很多可疑之处。既然这些作品都被说成是扛鼎之作,是“遗珠之憾”,那为什么在过去那么多年,这些明珠都没有被发现,都没有出版?历史从来都是不讲究情面的,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引发很大的争议。

好的就是好的,次等的就会在大浪淘沙之中被渐渐淘汰。对于这一点,读者完全可以信任,不用担心。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作品会被捧上了天呢?

发掘名人佚作,本无可厚非,这有利于丰富研究名人的材料。但是现在确实是有这样的一批人,明明知道这些佚作没什么大不了,也根本不具备代表性,却非要把次等作品说成是被遗忘的明珠,是了不起的作品。说到底就是为了多卖几本书,就是想从名人的名誉中榨取为数不多的最后的利益。这对名人是不敬的,对历史也是不严肃的,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是应该被否定的。

所以,一谈“发掘名人”就应该谨而慎行。不要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毁了传统,毁了前人积累沉淀下来的文化。

中国意象油画展在沪举行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由北京电影学院、潇湘电影集团、上海新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不期而遇——中国意象油画五人展”日前在上海新美术馆揭幕。本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担任策展人,展出了尚扬、马路、苏新平、冯

放、张方白五位著名油画家的大型油画作品。

意象油画在最近这些年成为了中国油画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现象,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油画家就一直有停止过油画民族化的努力,意象作为油画民族化的重要创作方法,汲取了

中国传统艺术的养料,把主观的挥洒、自由的表达和油画造型与色彩的语言逻辑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油画;二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逐步进入到了中国油画家们的视野,其中把中国的意象方式,用于油画创作当中,成为中国当代油画的一种重要探索。